

现代与传统丛书

# 法兰克福学派史

(1923 - 1950)

(美) 马丁·杰著 单世联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法兰克福学派史

(原名《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  
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 1923-1950》)

(美) 马丁·杰伊 著  
单世联 译  
陈立胜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小华

封面设计：迪 赛

## 法兰克福学派史

(美) 马丁·杰伊著

单世联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忠信路9号

856×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85,000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2101-8/B·45

定价 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这套书收录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真正的学术著作是联结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形质各异的铺路石。从小小的单篇论文到长篇巨制，都应在人类文化积累的永无止境的征途中留下自己大小不等的印记。一个中国学者，如果经受不住心灵的孤寂和思考的痛苦，不能坦然对待飞来的横逆和尘世的喧嚣，而冀图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多半是一枕黄粱。而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奖励不过是发现和创新的喜悦与傲骨的增长。这套丛书是为分享这些探索者的甘苦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当代牵动世界大事莫过于占人类五分之一强的中国人在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丛书优先关注的课题。

这个小小的园地是开放的。期待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赐予各种优秀论著。既欢迎可以单独出版的优秀书稿，也欢迎几千乃至几万字而新见迭出的单篇论文。有些意义深远而无法找到必要经费的研究项目，我们也愿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这套丛书是霍英东基金会慷慨支持的产物。当决定拨一笔资金支持这项学术活动时，有关人士只说了一句话：“你对历史负责，

· 2 · 法兰克福学派史

对社会负责。”我一再思考着这句话，企盼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秉承这个宗旨携手共进。

1995年春于广州中山大学

##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中译本序言

单世联

当一大批民间学术书刊迅速颠覆主流学术，当传统的汉宋之争以思想与学术、80年代与90年代之争再度搅动中国学人，当话语不同、背景各异的学术集团悄然可见，当一些本与中国无缘的学术如现象学、神学等几成显学……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确实呈现出某种亢奋和骚动。尽管学人们仍在抱怨市场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挤压和否定，尽管学术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和控制，但我们毕竟可以怀着热切而乐观的期待瞩望蠕蠕而来的新世纪。

然而，即使现有的“学术范式”能日趋完善、不断扩张，以至花繁叶茂、硕果累累，我认为也依然不够：中国还需要批判理论。

假如可以把“知识分子”这一极为抽象的群体分为政策知识分子（为政治集团设计方略提供论证）、技术知识分子（以其专业技能参予各分工领域）、自由知识分子（以其社会关切和价值信仰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表达），那么，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人文学者应当是属于技术知识分子，即以其专业之学致力于一个知识部门的累进和增长。在其成熟意义上，学术领域也有严格的等级体制和利益分配原则，而人文学者本身也更易于与社会现状相遇而安，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本与特定的社会条件没有根本关联。中国市场经济勃兴而学术文化前景看好是一个外在表征；通过学术与思想之争而体现出来的一些学人对激进的

公共介入和思想历险的厌倦和冷漠，则是一个内在证据。

可以认为，当代现实能够为比较纯粹的学者和比较超然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广大的语境，倒是倡导思想、颇具激烈进姿态的学人在现代甚显困窘。交换原则对精神活动、思想求索的排斥，意识形态的规整和限制，多教学人转向学术而使之徬徨歧路等等，固然相当重要；就思想者自身而言，似乎也缺乏充分的内在动力和准确的谈论对象。究竟何谓“思想”，我看也和其对立面的何谓“规范”一样难以清晰表述，还是不谈为妙。但我愿站在思想者的一边，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谈谈当代“思想”。

首先要说明两点，“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上帝面前，卑微的人连伊甸园都不能走出，如果一切都看上帝的脸色，人类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上帝自可发笑，人类仍应思考。再一个是，既然像 I·伯林、F·海耶克、R·阿隆等保守人士都是一流思想家，可见思想有多种型态，“批判理论”云云，只是其中之一。

所谓“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在其特定意义上，即是指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后期还包括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现代思想后，发展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批判理论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纳粹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霸权），并吸收当代社会学的经验技术，思想译利，义蕴幽玄，加上人物众多，组织一贯、历时甚久，不但成为当代思想界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能不聆听的清醒之音。

批判理论之所以诞生在德国，有其充分的传统积淀和背景期

待。处在东西欧之间没有“罗马化”的德国，历史地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拥有可能对现代化运动做出别一种反应的精神资源；而德国现代化的迟缓，又使其思想家可以审慎地对待现代性的突破，揭发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反抗现代性的第一代人物就是德国浪漫派；悲剧性的巧合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和人类史上最残忍的奥兹维辛的制造者，德国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内在痼疾，提供了不尽的批判话题。最后，活跃于德国思想领域的精英人物，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斗士们，多为摩西的后裔，他们在德国的边缘地位有利于滋养其突兀峥嵘的批判意识。所以广义地讲，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与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派对古典哲学的实践性转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号，弗洛伊德对文明压抑人性的揭发，海德格尔早期对西方历史遗失“存在”的发现及晚期对“技术”的敌意等等，均属批判理论的家庭成员。其“家族类似”或可概括为“反抗现代性”。

“反抗”，不是知识精英对现代世界怀旧的、禁欲式的拒绝，而是汹涌澎湃的现代化运动本身激活的精神反应和思想姿态，它正视现代性整体结构中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的越位、恣恣的现实，确认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改写并扩充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的否定精神以推进现代性的自我校正。反抗现代性是真正的现代思想。“反抗”也不是暴力行动和革命实践，而是基于人性潜能的理论反思和文化批判。批判理论家认识到，在20世纪被管理的恶梦中，社会总体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真正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力量已分崩离析，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异化回归自身的动力——否定之否定也消蚀殆尽，一切合理的要求只能以缄默的否定



形式出现，理论是向诚实的人们敞开着实践的唯形式。因此，批判理论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实行剧烈变革的主张，拒绝向他们寻求实现其观念的社会力量妥协，自觉选择（或退入）思想领域：“主体与客体、语言和事物不可能在当前条件下整合，我们被否定性原则驱使，企图从虚假结局的残骸中拯救相对真理”（阿多诺）。批判理论把思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坚持前者的优先性并反复比较，以超越作为暂时的历史现象的后者。

20 世纪的中国在动荡和恐怖中蹒跚走过。悠久的文明传统与现代世界的冲突所透露出来的，不只是时代的错位和文化的差异，也映衬出现代性的难堪和悖论。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兼济意识迄今仍积重难消，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重要的还有，拘谨贫困了数千年的国人在获得经济发展权后，像当年“政治挂帅”一样走向“经济挂帅”，利益标准、物化机制、交换原则渗透到一切非经济领域，精神萎缩、道德失范、艺术衰颓等等已绝非盛世危言。而大众文化却凭借其利润效果和现代传媒迅速播散，客观上操纵着文化主流，诱使文化平庸化、均质化、模式化，使大众丧失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资禀。更遑论从意识形态与技术控制的合流到政治全能和市场乌托邦的循环等一系列严峻的现代性问题了。所有这些，都逐步成为我们当下遭遇的情境，迫使我们向文明的内在演进逻辑和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的质疑，批判理论也就呼之欲出、在所必需了。随便翻翻有关的文化评论，很少没有批判理论的潜在踪迹。如果思想不同于学术，总是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状态

并表达人性的理想追求，那么，当代思想首先必须是批判的。只有从这里，思想才能找到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灵感和语言。

批判的不谐和音也曾打破古中国的沉寂静阒，如汉末的清议思潮、晚明的儒学异端、近代的入世佛学等，但现代中国却没有批判理论滋长的土壤和空气。实业和科技、革命和政治在民族危机面前被视为中国新生的必由之路，被抛离中心的知识分子急于向总体需要和权力集团认同，少数具有批判气质的人如鲁迅却不得不在大雾弥天、风沙扑面的境况中寂寞无助，“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客观地说，严格意义的批判理论是现代社会的伴随物，在一个幅员辽阔、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批判理论不但是一件奢侈品，而且根本没有自己的对象。于是，当现代化在世纪末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批判理论才终于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

但，我们还缺少批判理论的另一个维度：根据和信念。我们何以能够批判现代社会和文化？奥兹维辛肯定是罪孽，因为它灭绝无辜平民。但大众文化比如广告和流行音乐呢？它们不是每天都在殷勤而周到地满足着现代人吗？西方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个体自由、幸福等等都是批判理论的基本准则，其中最主要的，首推古典哲学的“理性”。“哲学就是把理性带到世界上的不倦的方法论尝试”（霍克海默），理性不是构成现代性核心的、愈益“僭妄”的工具理性，不是抽象空洞的逻辑范畴和思维形式，也不是外在于历史的超越观念，而是思想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形式，在当代，它存在于对资本社会的内在批判之中。“如果理性的含义是依照人们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由决断去改造生活，那么，对理性的渴求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

个人在其中可以依照他们的需要经由集体的努力去规划他们的生活。随着理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实现，哲学就会消亡。展示出这种可能性，并为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好基础，这一切恰好就是社会理论的任务”（马尔库塞）。鉴于人类在 20 世纪的特殊处境，批判理论还接受了精神分析对人性结构的解释，确认文化通过压抑而实现进步。在创造性地整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后，批判理论把真实的、自主的需要与虚假的、受控的需要区分开来，连带提出“必要压抑”与“额外压抑”，“施虐—受虐”的社会性格，“匿名的权威”，真假自由、真假幸福等观念，揭示已经消除了物质匮乏和政治压迫的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舒舒服服”的压抑和异化，进而展望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前景。

相信一个可以普遍认可的理性，相信人性有一种本然的真实，这些与解构哲学要清洗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本身又有何“支援意识”呢？除古典资源和审美视角外，与批判理论并非充分自觉的犹太教观念相关。阿多诺终生不能忘情于“救赎”的悲愿；弗洛姆总是激动于“普遍和平”的弥赛亚幻象；本雅明迷恋于名物一致的原始语言；贯穿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犹太教思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隐蔽的神学”；直到晚年，霍克海默还一再表述“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先知般的勇气，救赎的热情，深深潜藏的乌托邦冲动，绝望了的希望，如果据此而认为批判理论的经历是 20 世纪的一种准宗教行动，也许并不为过。

作为中国哲学第一原则的“天理”，被宋儒解释为人性所本有，这不但以道德理性取消纯粹理性，也使人性本然湮没不彰；至于拯救情怀、宗教意识等，素为中国人所漠视。所以今天的思想虽面临着与批判理论相类似的处境，却没有批判理论据以建立

的原则、标准和理想。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认同解构哲学，“争后恐先”的原因之一。后现代思潮自有其批判含义，它和批判理论家，特别是阿多诺、本雅明的亲缘关系也早已得到确认，这中间谈不上谁是谁非，但社会哲学自应与语言哲学、文学批评有别。霍克海默曾批评无政府主义因为不耐烦地否定一切权威而与专制主义相反相成。解构哲学、后现代主义是否应对此保持警惕呢？法国大革命后期，无套裤党人的激进就是和恐怖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可见，中国批判理论的创立，需要从头做起。除睁眼看现实，开掘一切可资利用的传统宝藏外，准确而完整地学习西方批判理论是当务之急。这本《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就是一本精当的、任何有识之士都不能回避的批判理论的“引论”。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我们才可能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只有严肃地培植现代社会中否定的、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最终有所肯定。否定而不是不成熟地寻找各种解决方式是真理的真正避难所，正如本雅明说的：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ose without hope is give to us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1995.12.18

## 关于本书作者及其著作

单世联

Martin Evan Jay (其著作均署名 Martin Jay), 1944 年生于纽约。1971 年以论文 “The Frankfurt Schoo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für Sozialforschung, 1923 - 1950” (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研究所的思想史, 1923 - 1950)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7 年开始在美国学校任教, 1982 年后为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

20 多年来, Martin Jay 多次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从事研究、举行讲座, 多次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并担任一些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的顾问。Jay 学养渊深, 持论公允, 是当代欧美思想史领域活跃的知名学者, 尤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

其著作有:

1.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 - 1950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 1923 - 1950),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年第 1 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年第 2 版。

此书以客观的态度叙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从成立到 1950

年迁回德国的历史，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其“英雄时期”的主要思想成就。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霍克海默亲自写序，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当事人及F·杰姆逊等著名学者均给予高度评价。现已译成德、法、意、荷、西、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韩等8种文字，中译本改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

2.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从卢卡契到哈贝马斯一个概念的历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年版。

此书引论描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演变，第1章追溯了“总体性”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轨迹，从第2章到15章，分别论述了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列菲伏尔、戈德曼、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关于总体性的思想，以“后结构主义的挑战”作为结束语。作者把“总体性”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式”，描绘了它在卢卡契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那里引起的兴奋和自阿多诺以降引起的幻灭，及其由此幻灭预示的当前解构哲学。作者认为，当代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有赖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总体理论与以富科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有效对话。

此书已译成日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中译本亦在进行之中。

3. *Adorno* (阿多诺)，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年版。为伦敦“fontana”“现代大师丛书”之一。

“总体性”到阿多诺这里已经崩溃，对总体的不信任，对非同一性的强调，使其哲学成为“无调哲学”，其表达方式也是非

体系性的。此书以阿多诺本人的方法，围绕阿多诺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主义、文化贵族的保守主义、犹太情感和解构主义等5种并列而不整合的要素来批评性地论述阿多诺哲学，是关于阿多诺的最权威的著作。

此书已译成意、葡、西、日、法、斯洛文尼亚、瑞典文。中译本有两种，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胡湘译本，二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中瞿铁鹏、张赛美译本。

4. Permanent Exiles—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永恒的流放——关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论文),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年版。

此书收论文15篇，9篇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涉及到批判理论的宗教背景及其在50年代之后的发展。其中“乌托邦的元政治学”、“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反犹太主义与魏玛左派”、“犹太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肯定的与否定的总体性”等都是专题论文，可以看成是在《辩证的想象》、《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两部通论性著作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另外6篇是关于G·利希特海默、S·克拉考尔、H·阿伦特、H·巴彻特等德国著名知识分子的论文。此书与《阿多诺》、《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一起被称为“Martin Jay的法兰克福学派三部曲”。

此书已有日译本。

5. Fin-De-Siecle socialism (世纪末的社会主义), Routledge 1988年版。

此书第一部分“从思想史到文化批判”收文4篇，探讨一些方法论问题，包括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保守主义的激进

含义等等。第二部分“解读社会主义遗产”收文12篇，大多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如“维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与审美救赎：霍克海默与克拉考尔的争论”、“哈贝马斯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等等，对批判理论的最近发展及其与其他哲学思潮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和上一本论文集一样，作者特别注意解构哲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此书已有西、日文译本。

6. Force Field: Betwee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ritique (力场：思想史与文化批判之间)，Berkeley 1993年版。

此书我未见过，估计是关于目前德国思想的论文集。“力场”这个概念是阿多诺提出来的，指由吸引和排斥的关联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现象的动力学结构，可以有效地解释既构成又变动不居的现实结构。Martin Jay在《阿多诺》一书中已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分析阿多诺哲学。

除上述6本著作外，Martin Jay还编辑了好几种文选和资料，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上百篇文章。他的著作，是研究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必备参考书。



## 序

亲爱的马丁·杰伊：

您邀我为您论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历史的著作写序，确实，读后的喜悦之情使我不能拒绝这一请求，然而，健康状况迫使我只能以简代序。我首先感谢您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您的描绘，这本书中的许多往事也许早被忘却了。

研究所从德国流亡前的工作——人们会想起波洛克 (Pollock) 的《苏联 1917—1927 计划经济实验》或随后出版的集体著作《权威与家庭》——与当时的官方教育体制相比，是一个新东西，它意味着能够进行大学没有提供机会的研究。这个事业的成功仅仅因为——由于 H·韦尔 (Hermann Weil) 的支持和他的儿子 F·韦尔 (Felix Weil) 的参预——一群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都对社会理论有兴趣的人，他们怀着在一个转折的时代，陈述否定比学术事业更有意义的信念聚集到一起，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考察。

差不多在 20 年代末，确切地说是在 30 年代初，我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掌权，也相信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对付它这一事实。但我们没有想到它需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本以为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造反，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思想中有决定性意义。当然，在我们经过日内瓦到达美国后，对社会事件的马克思